

经济学的真相

13 Persistent
Economic Fallacies

13

个严重的
经济学谬误

[英] E.J. 米香 (E.J. Mishan) 著 靳继东 焦玉娇 译

東方出版社

经济学的真相

13 Persistent
Economic Fallacies

13

个严重的
经济学谬误

[英] E.J. 米香 (E.J. Mishan) 著 靳继东 焦玉娇 译

東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的真相: 13 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 (英) 米香 (Mishan, E. J.) 著. 靳继东, 焦玉娇 译.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0

ISBN 978-7-5060-3928-4

I. ①经… II. ①米… ②靳… ③焦… III. ①经济学—研究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15804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Thirteen Persistent Economic Fallacies*,
by E. J. Misha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Praeger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ABC-CLIO, LLC,
Santa Barbara, CA, USA. Copyright © 2009 by the author (s). Translated into and published
in the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by arrangement with ABC-CLIO, LLC.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printing, or on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ABC-CLIO, LLC.

本书由 ABC-CLIO 公司授权出版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东方出版社所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7627 号

经济学的真相: 13 个严重的经济学谬误

作 者: [英] E. J. 米香

译 者: 靳继东 焦玉娇

责任编辑: 姬 利 贾 佳

出 版: 东方出版社

发 行: 东方出版社 东方音像电子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印 刷: 北京智力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25

字 数: 97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060-3928-4

定 价: 23.00 元

发行电话: (010) 65257256 65246660 (南方)

(010) 65136418 65243313 (北方)

团购电话: (010) 65245857 65230553 65276861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拨打电话: (010) 65266204

序言

本书是拙著《21 个广为流传的经济学谬误》（1970）的一个续篇。相对于前一个版本，本书中所探讨的经济学谬误数量有所减少，这部分是因为：在 20 世纪 60 年代，只有少数几个经济问题赫然突出，并已置于公众视线的关注之下，它们包括“美国经济统治地位”、“工资所得税”（错误地被当作鼓励投资的手段）、所谓的“人才外流”以及若干有关改善“经济增长能力”的问题。另外一部分原因则是，我决心要从更深的层次去看待那些更顽固的谬误。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西方经济迅速增长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人们生活中持续上升的压力和焦虑感。这一趋势在所难免，深刻的技术变革导致现代生活节奏加快和复杂程度日益提高，从而增加了人们的生活压力和焦虑感，尽管这与芸芸众生的本来愿望背道而行。

战后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后果是，它对我们的生活状态，以及现代政府为应对那些由于科技革新的广泛传播而产生的社会问题所采取的匆忙立法行为，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不断高涨的市场需求使得国会疲于奔命地进行立法，政府很少有时间和耐心去通盘考虑，遵循那些他们期望通过的规章将会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并向公众说明这些后果。当然，这并不包括那些通过相当肤浅的方式为了鼓励达成共识或至少是默许而

通过的规章制度。政府不止一次信誓旦旦地向民众保证，它已经听取了专业建议，或者已经就那些立法建议与相关的利益群体展开了详细的商谈。更糟糕的是，我们过于依赖这样的观念：国会议员专注于立法，就足以使我们确信这些立法符合“国家利益”。

如果政府当前正欲实施的政策对我们福利产生的影响有限，那么他们急于“做好本职工作”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就像上面提到的，当前立法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众多约束和规制，的确对我们的福利产生诸多影响。此外，无论区域化还是全球化，它们对政策的影响也在日益增加。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新技术革命出现和世界人口暴涨最主要的后果之一，就是“我们正接近于生态灾难的边缘”已不再是危言耸听。从我们城市里及高速公路上日益拥挤的机动车辆，到由于医学的解放创新产生的益处而导致的当代伦理与宗教间的冲突，新技术的采用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外部负效应：这一效应从核毁灭的威胁一直延伸到地球上的人类本应该保护的臭氧层的持续消散。在这样的形势下，所有国家的政府做出的政治决定都有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最可怕、最痛苦的后果。

近来，对重要经济议题的真知灼见式的讨论有所减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政府和反对派都易受到那些已经过时的、所谓“有远见的”自由主义教条的影响所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国家任由那些受错误经济学假设指导来制定政治政策的人来治理，着实令人不安。人们常常对下面的部分满怀信心：经济增长加速（作为传统测量指标）、人口流动性增强、国家出口增加或是大学生数量扩张等，必定会把我们尽早带入发展的黄金时代。而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权势集团以及大多数受过教育的民众不加任何质疑地就接受了这些经济命题，从而使得当前关于经济问题的争论易于浅尝辄止、流于表面。

毋庸置疑，通达之士间的明智辩论已日趋减少。对此，公众可将其归咎于所谓专业的经济学家。他们既没有清晰明朗地解释那些正在提上议程或是已经实施的经济政策的涵义，也未能及时地提出那些实际上可以更好地实现预期目标的备选方案。单从这一点来看，公众就不用指望透过那些由“专家”罗列出来的经济政策的神秘面纱看出什么，

002

因为所谓的“专家”都不过是为雇用他们的政府偏好进行辩护的人罢了。

联邦政府的执行部门会雇用或咨询那些赞同其观点的经济学家，而这一点常常并不为人所知。这些为政府提供咨询建议的经济学家，即便在关于具有政治可行性的经济建议上最初没有任何预设立场，但最后可能也慢慢地向着政府的方向靠拢。雄心壮志的驱使或者只是要感知自己对其所服务的部长们不负所托，以及与同行们、公务员、政客相处的需要，所有的这些都使得他们开始从政治可行性着眼来思考经济问题。举个例子来说：经济学家可能深深地懂得，在货币政策上，可变汇率或者说是浮动汇率（可能要伴随着若干保障措施）比固定汇率政策更有利于平衡国际收支。但是，如果从实践角度出发，或是从合作伙伴所确信的方面考虑，那么这位经济学家就会得出浮动汇率“根本办不到”的结论。他很清楚，如果将自己这些主观意识的个人观点带入到公共决策中，那么只会让政治决策者无所适从而倍感郁闷。经济学家当然不愿去承担被人怨恨、漠视的风险，而宁愿与现实妥协，为经济政策的备选方案加诸政治性约束。这样，他立刻会被政府、更确切的是被权威机构认定为一个谏言者，一个温和的、明智的经济学家，一个可以被信赖和依靠的合理经济建议提出者。

鉴于这样的政治现实，公众确实有必要更加明智地应对经济问题。

为达到这一要求，诉诸实践一度流行于美国。一流的经济学家们不再痴迷于在专业性期刊上彻底解读那些晦涩难懂的经济理论，而是转去阐明前沿经济问题，从而使明智的民众更好地评估替代方案，进而促成一个更富智慧的辩论。

于是，在非专业交流、不诉诸公式的情况下，经济学家，事实上包括物理学家、化学家在内的所有科学家们，在给定行动和程序的条件下，就不会带着丝毫居高临下或者流于表面的态度，与民众就政策后果、影响进行可预期的顺畅交流。此外，至少从科学家的角度来看，通过这种揭示逻辑链条的迂回方式，他也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在本书中，我们将寻求一个补充性途径，即：使相关的民众更容易接受那些揭示许多传统的经济常识其实只是谬论的惊人之论。如果说

前一种方法在处理热点经济问题时具有优势，那么后者（即本书所采用的）在阐释方面则更具有深度，对那些没有时间或意愿去钻研经济学著作的理性民众们来说，这样可能更具感染力。然而，就像已经提到过的，这两种方法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它们都非常有助于增加民众中习惯性的、明确的批评声音，而这些批评恰恰被视为政府的祸害、民主的生命线。

如果说这本书就是致力于揭示更多顽固的经济学谬论，这未免有自以为是之嫌。即使它获得了民众的青睐，也将因社会的疏离而渐行渐远。就像托马斯·布朗先生在他的《一个医生的宗教信仰》中所论述的：

异端不但不会与他们的创始者一同消亡，反而会像艾里苏萨河那样，虽然在一个地方断流了，但会在另一个地方崛起。一个总教会不可能根除一个单独的邪教，也许你能取消它一时，但是随着时间齿轮的转动，来自“天堂”方面的欢喜，又会使它恢复朝气蓬勃的发展，直到它再次受到谴责为止。

我发现，如果仅仅简要地揭示经济学谬论的错漏所在，远不足以抹去社会对它的接受度，因为它将不断地在传统经济论述中找到归宿。但我有理由希望，这本书足以扰乱政治家和官员那平静的心态以及许多战后的正统学说。比如：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源于经济的持续增长，劳动力移民给国家带来经济利益，或者是我们不得不承担国家债务增加所带来负担，这些都将被清晰地揭示为谎言。

在讨论谬论时，我在广泛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以涵盖那些不精确的或是错误的论调，以及那些有关经济领域的错误观念，偶尔我也把它延伸为包括对问题复杂性的一个不完全赞赏（比如建立共同市场的经济意义那一章）。

我的论述范围已经划定，那么现在就可以这样说——或许会带有一点点骄傲的叛逆感，那就是：几乎所有我所选择的谬论都渗透在社会上最受尊敬阶层的讨论之中，出现在参、众两院议员的演讲中；出现在内阁部长们庄严的言论中；出现在《纽约时报》、《经济学家》以及其他久负盛誉的报纸和杂志的主要专栏里。然而，更常见的是，这些带有

争议的谬论挖掘出一些拟议中的政治措施所隐含的基本假定中的奥秘，但我必须克制使用“指名道姓”的做法，那是非常不公平的。我这里所讲的谬论都有一个特点，它们既不愚蠢也非无知。事实上，这些谬论表面上看起来都是相当正确的，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力地影响、引导着公共舆论。因此，即便有智慧的民众支持它们，也是情有可原的。

一些解释性的评论或许可以使那些坚定崇尚现实主义的读者更加相信这一点，即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文章的简单结构将足以得出有效的结论。我十分清楚理论经济学家在探讨经济问题时往往采用“象牙塔”式方法，即在谈论一个经济分析时“先让我们假定这个，再让我们假定那个”的方式。然而，读者可能对这种为逃避真实世界的复杂性而过度简化的书籍中得出的结论已经相当厌倦了。

如果当前的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描述现实世界中人们的实际行为是怎样的，那么这些顾虑或许就是合理的。但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是秉持独立相关前提这一观点的——即使他们秉持的是被简化了的假设，那些前提也都是从已经被实证论据证明是正确的结论和推论中得出来的。因此，只要所有的推论都是从那些被采用的、不与实证经验论据相矛盾的前提中合理推断出来的，那么这些被采用的前提都将继续被使用。然而，所有的经济推论都要受到一种叫做“其他条件不变”条款的制约；也就是，“其他情况一律相同”，或者更确切一些，其他（密切相关的）情况保持不变^①。

然而，除了一个基本的公理，在后面的章节中只有一个行为假定被默认接受。这一公理是主流经济学的概念基础中固有的，它甚至可以追溯到发生在1870年的理论经济学革命。在那次革命中，价值主观论有力地推翻了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理论。从那以后，一个良好价值对于一个人来说，是值得用他愿意支付的最大额度来衡量的；而一个不

^① 在移民对经济的影响这个论述中（体现在谬论2），其他条件不变条款也坚持东道主国家的原住人口保持恒定。任何对移民的经济影响的评价都必须将移民数量纳入重点考虑，并以此论定东道主国家是移民过剩还是限制移民。从美国的情况来看，战后来移民的人口已超过移出居民的规模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它就意味着，如果只按照移民过剩条款来进行分析，那很可能是受到美国经验的影响所致。

良价值，则将用一个人勉强忍受它所愿支付的最小额度来衡量。

就像通常被人们称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作为一个行为假定，它只是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对一种商品的价格下调做出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其他条件不变条款包含了这样几个必要条件：经济总收入和经济分配二者皆保持不变，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原状，当然还有人们的兴趣偏好不能改变。

但是，它很好地论及：尽管这些状态没有达到其他条件不变条款所规定的要求，一个商品价格的下降也很可能引起其需求量的上升。

此外，读者应该牢记经济学家们经常使用的两个术语。一个是描述促使总收入增加的经济转变，叫做“经济增长”。虽然“经济增长”这个术语确实使人联想到它也是令人满意的，但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它与情感内涵是没有任何瓜葛的。不然的话，当谈到状态Ⅱ（经济增长后的状态）的总收入超过状态Ⅰ（原有状态）的总收入时，定义上比较方便，也就是说状态Ⅱ在经济上优于状态Ⅰ。我们用一些论据来充实一下这种定义，尽管一些人在状态Ⅱ的情况下生活境况比在状态Ⅰ时更差，但是状态Ⅱ中假定的总收入再分配确实可以使状态Ⅱ中的每个人情况都优于状态Ⅰ。总之，对于每个人来说，状态Ⅱ相对于状态Ⅰ都是一种潜在的更优状态。

“经济效率”这个术语也沿用同样的释义，即用总价值（等于每种商品经济消费的总量乘以它的相应价格）来衡量。因此，如果一个经济学家这样表述：在特定条件得到满足的情况下，经济效率是增长的。那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满足一定条件，经济消费的所有商品的价值将会增加。

然而，这些简短的限定性术语并不意味着，经济学家们对于可能发生在效率递增的经济后果中分配递减效应是漠不关心的。如果能够预见得到这一点，他应该也一定会将这些来自于任何经济变化中、带有标志性的的重要分配效应都放在考虑范围之内。但是作为经济学家，他本身不能将收入分配排在其他因素之前：这里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标准来为收入分配排序。的确，有这样一个假定，即西方国家都更赞同平等的或者说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但是，这只是一个理想化的设定，或者

仅仅是一个更优于现存分配方式的假定。归根结底，它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

在接下来的各章节中，我将严格要求自己不受价值判断的困扰，根据事实（要么正确、要么错误）来进行评判。正所谓：一个人从描述性的观点中是得不出规范性的论述的。因此，从“大规模的移民行为会造成东道国人均实际收入减少”这个论断中，而得出应该限制向英国移民这个结论是很不恰当的。尽管我们接受了移民行为会导致人均实际收入减少这个事实，但由于道德方面的原因，我们可能仍然支持移民：即我们可以说，相对于不幸出生于贫穷国家的人，那些出生于西方富裕国家的人并不就应该得到更富裕的环境；对于那些移民来说，出生于落后的国家并不是他们的过错。或许我们可以秉持多种族、多文化有益于社会发展这样的信念，来欢迎移民们到我们这里来，因为这种多样性本身就意味着灵感、生机与乐趣。

显然，上述观点表明，当一个人发现理性的民众们继续认同向英国移民可以为他们的国民带来经济效益这样的“政治上正确”的观点时，他的悲伤会多于气愤，因为这很可能是由于人们急于让自己被划入开明人士的行列之中，也或者是惧怕被人当成是心胸狭窄的人或种族主义者。

这里有一个启发性的例子，2007年12月14日，在英国广播电台4频道“任何问题”这期节目中，四位著名人士组成的专家组对一个听众的提问作出了回应，他们四个人里面有三位毫不犹豫地断言：进入英国的移民对国家经济有益^①。

在诸多有关移民有利于保障经济利益的错误辩解中，有些还给出了为何如此的一些简单解释。为准确起见，这一点也应该纳入我们的考虑之中。尽管每一个这种解释性的主张都显得可笑甚至荒谬，或至少有些言不由衷^②，但却给那些让我们去评估“移民经济效益”影响的人

① 而且，第四个人并不积极地反驳其他人的主张，而是仅仅局限于如下观点：英国事实上已经是所有工业化大国之中人口最稠密的国家，从而无须鼓励外来移民。

② 其他无意义的说法还包括：（1）移民为经济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其恢复了活力。（2）移民有助于为英国日益增长的老齡人口提供财政支持。（3）移民劳动力在承担那些当地人拒绝去做的比较脏的工作，或是低等的工作方面是很有必要的。

以有力回击。举个例子，他们所谓“对英国经济的贡献”（所有外来移民进入英国之后所有收入的总和）^①——不过就是一项足以进入吉尼斯世界纪录、惊世骇俗的愚蠢说辞罢了。

不揣冒昧，我仍保留了拙著《21 条广为流传的经济学谬论》一书中的序言；那篇序言是已故的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先生写的，他是我以前在伦敦经济学院工作期间的同事和密友。尽管总是给人以严谨、挑剔的思想者的印象，但他对经济学方法论的阐述却格外清晰、堪称典范——事实上，我坚信，经济学分析中的“游戏规则”一定会赢得读者的青睐。的确，读者在本书中无须大费周折找寻其他别的什么，也一定会觉得本书物有所值。

^① 见谬论 2 的注释 5。

一份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备忘录

库尔特·克拉普霍尔茨

—

在本书随后的章节中，米香博士将竭力阐明，在经济问题方面许多被广泛接受的观点实际上都是谬论。根据《简明牛津词典》所示，谬论是指“一个误导性的观点、诡辩，具有无效的缺陷、狡辩……幻想、错误”。因此，至少在人们的脑海中，“谬论”指的是逻辑错误。事实上，在多数揭露某些观点荒谬性的尝试中，米香博士都将重点集中在它们的逻辑缺陷上。例如，米香指出，如果这些谬论是牢不可破的，那么，“增加国家负债将造成未来世代的负担”这一观点的倡导者们，也就不得不对“政府在增加当前投资中的任何过失同样会给未来几代造成负担”这个观点上进行合理解释，尽管这貌似不是他们的观点。因此，它们看起来都是相互矛盾的——所谓的一致性就是一个逻辑问题。

一个观点要想被接受，首先它必须摆脱逻辑错误。逻辑错误相对容易发现，但是一个观点不存在逻辑错误并不能保证它就是真理。举个例子，有两个前提：

- A. “所有人都是长生不老的。”
- B. “约翰是个人。”

从而得出：

C. “约翰是长生不老的。”

这个例子的逻辑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它的主要前提和结论却都是错误的。即使不是大多数，经济学上也还是有许多关于命题对与错的争论，这些命题可能往往就是一个观点的前提假设或是结论。这些命题可能是“收入所得税率的提高会造成工作动力的减弱”；“货币贬值有助于平衡国际收支”；“收入政策对于结束或减弱通货膨胀是有效的”。这些命题的正确与否并不能单独用逻辑观点来判断，如果它们本身是错误的，它们仍然是谬论。因此，我们必须转而探讨如何去判断经济学中的对与错。

二

当然，所有人都十分清楚，在许多热点问题上，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是各持己见的。确切的讲，人们可能认为党派间政治纲领的不同主要源于，或者至少是部分地源自于那些对各种可能影响特别是经济政策的观点不同。因此，旧有的问题就又出来了：为什么在如此严谨的科学性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各政党仍然在高额税收、削减关税等计划的现实成效问题上争论不休。实际上，在类似于像物理或者化学这样一些科学性问题上，他们并非同样反对，而是根本就拿不出什么观点。（至今为止，还没有哪个政党声称，在他们看来，一个人通过拍打他的双臂就能飞起来。）那么，为什么在社会科学领域中采取特定行为的后果预测上，会存在如此多的分歧？一些人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上述主张根本就是科学的；人们对它们是对或错的认识是由自己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决定的。由于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认为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即使不考虑一些反对的意见，这种观点也是不正确的。要弄清楚“征收土地开发收益税是如何影响其市场价格的”这个问题，与其他任何关于特定实验的影响问题实际上并无二致。

众所周知，自然科学家们通过做实验并留心观测实际结果是否和他

们的预期相符这个方法，去尝试回答天地万物的相关问题。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分歧终究会被解决，人们也会转而注意其他新的问题。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解决科学问题的方法是不可替代的。假如像“充分就业能否与物价稳定相容共存？”或者“罚金能作为遏制谋杀行为的手段吗？”这类问题要得到令人满意的答复，那么我们就要检验那些关于“充分就业对物价的影响”或者“罚金对谋杀行为的影响”的预测是否与我们实际观测相符。

经济学家之间总是存在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在开展经济学可控实验方面存在难度。这些困难包括如下情况：通常，由于受“其他条件不变”条款的影响，预测往往会被从经济理论中扣除。因此，当我们在考虑征收土地开发收益税的相关影响时，通常会将其他变化抽离出来，比如，人口的增长，是否存在通货膨胀，或者建筑技术的变化，它们都有可能影响土地的价格。例如，科学家们做了一个实验，去研究自由落体时人体的反应，那么他可以做很多工作以排除气压的不良影响；但经济学家们就不能同样将技术变革所产生的影响排除在外。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夸大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这方面的差异。无法保证“其他条件不变”，本身并不是困难的主要方面，这也让我们明白：（a）“其他条件”是如何改变的；（b）变化是如何影响我们感兴趣的事情的。举个例子，假设我们预测征收开发税本身对土地价格没有任何影响，但这种影响却恰恰实实在在地发生了，以至于在征税的同时，小麦的价格出现变化。如果我们知道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土地价格，那么就会在预测税收影响的时候将它考虑进去。然而通常情况下，我们没有这些认知，我们无法在考虑了小麦价格的变动之后再去进行预测。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思维实验在经济学中具有如此的重要性，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思维实验将频繁出现。必须再次强调，“思维实验”包含了对某些个体行为假设的逻辑后果的追踪，这对于核查观测结果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如上面所阐述的，完美的逻辑并不能保证结果的正确。还有，尽管一个合理明了的论证在达成预期效果上有一些优势，特别是在考虑不同假设的逻辑后果时这种优势更加明显，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方式，谬论将被暴露出来。

这样说可能相对公正些，大多数人对经济学感兴趣，仅仅是或者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经济学对政府的政策具有很大影响。到目前为止，人们对于政策的质疑基本上都因为事实与预期结果的不符。然而，也许有人会说，即使实际结果完全符合他们的预期，对于政策的不满还是会存在。原因很简单，大多数政策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比如，美国农民在取消农产品价格支持这一政策的预期后果上可能完全赞同城市居民，但这并不足以使农民们支持废除这项支持政策。无论如何，任何利益集团都不会公开宣称，它赞同那种靠牺牲社会上其他成员利益来使自己受益的政策。确切的说，它将提出既有利于实现自身利益，同时又能实现社会利益的“合理的经济论证”。我们都明白，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往往是互相冲突的，那么，这个看似“合理的”的论证，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人们对其合理性或者说无瑕性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谁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看上去就是貌似有理的狡辩组成部分的经济分析本身，不过是某些特殊的诉求而已，那么他将会得到谅解。

就算经济学理论经常被用来支持那些具有冲突性的政策，我们就一定能得出“经济学除了是特殊利益的合理化以外就一无是处了”这样的结论吗？当然，这样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因为任何一个理论在可以被使用的同时，也可以被滥用。但我们还是要考虑，物质利益上的或是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会否以及将以何种方式去影响一个经济论证的结果。

我们必须马上强调一点：我刚刚说的是民众用经济学观点去支持或者说去证实某些政策的情况。如果从通常意义来讲，我们眼中的“经济学观点”是指关于某些政策预期的实际效果，仅从这个角度看，任何一项被制定的政策都不存在支持或反对的情况。正如某位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不可能从“是什么”中推出任何“应该是什么”的结论。据我所知，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这一哲学立场。然而，如果这就是我们关于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之间关系所要说的全部内容，那么，我们关

于这一点的讨论也必须以一个简短的论述来就此结束：经济学告诉我们，或者更确切的说是告诉我们事物的实然情况，而非其应然的方向。既然经济学从不教给我们应该去怎么做，也可以说它从不隐匿任何意识形态的偏见。

然而，这个观点太欠考虑了。我们不妨考虑一下，一般来讲，一个人的“意识形态”究竟是如何去影响他的经济学观点的呢？

让我们马上来处理一个在米香博士论述国债的“负担”时引为例证的观点。这个观点是这样的：在日常具有强烈情感色彩的会话中，经济学家们通常会使用一些带有专业感觉的词汇。比如，经济学家从专业的角度去定义“效率”这个词。然而，在这一定义的基础上，往往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垄断、限制性政策或者关税会导致“无效率”。正如我们刚刚讨论的，仅从这些结论完全没有得出有关垄断、限制性政策、关税不可为的含义，但公众们往往忽视了这一点，他们倾向于这样去理解问题，即认为“效率”就是那些应该被提倡的事情，而“负担或者麻烦”就是应该被规避的事情，等等。因此，人们常常认为，尽管观点是相对立的，但经济学会告诉我们应该去做什么，从而使我们有一种清晰明确的意识。上述种种试图表明，如果经济学家们尽量去除他们言语间那些颇具感性的措辞，会使这一观点看起来更适当些，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是建立在逻辑错误基础之上的。即便这样，我们还必须强调，无需用情感性术语来迷惑任何人。如果一些经济学家宣称，“充分就业、通货膨胀和关税会导致无效率”，那么听众就会对是否支持这三个问题而迟疑不定，他们全部要做的事就是去咨询提出假设的经济学家，让其解释清楚到底“无效率”是什么意思。然后，听众们才能决定那种“无效率”是否是他们希望避免的。

有一个具体的例子，能非常容易地阐明，在抑制批评性的讨论中绝不要使用情感性措辞。在美国，“社会主义”这个词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社会主义”往往被认为是坏的、不好的。许多美国人都反对当地的一些关于国家卫生服务的议案，就是因为它带有社会主义性质，不符合美国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就可以这样问他：此时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得到的答案可能是：“社

会主义”意味着那些医药服务将被免费或者以低于成本的价格提供给消费者，而补贴所需的资金要由税收来提供。如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美国的大学预科教育体系也具有典型的“社会主义”性质了，而人们常常将此视为美国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如果我们假想的评论家赞同美国的教育体系也具有“社会主义”性质，那么我们要马上对他说，他的反对不能仅仅局限在对“国家卫生服务”这种“社会主义”性质的提案上面。如果他坚持反对在医疗服务方面的国家补贴，他必须给出其他理由。

四

现在我们来查看一些有关于一个人的思想可能会影响其观点形成的例子，这些例子都取决于“其他条件不变”条款。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原因”的概念有时被采用的方法。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通货膨胀的原因是政府开支过度”，或者“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的原因是境外军事开支过度”。举个例子，那些一方面反对通货膨胀，一方面又赞同政府高额开支的人该怎样去反驳这样的观点呢？或者他一定要在支持后者和反对前者中放弃一样吗？

首先，应该认识到，即使有一个单独的或主要的原因，那也不能由此认为，一个单一的或主要的补救措施就能消除这个诱因。事实上，在提出补救措施时，了解“原因”并不总是必须的或者相关的。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有人告诉我们，导致一个人贫困的原因是他失去了手臂，从而使他无法胜任工作，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复原他的手臂。一般而言，当我们在面临一些我们希望去补救的状况时，比如：贫困、通货膨胀、国际收支逆差，我们要考虑的相关问题不是“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什么？”而是“我们有什么样的替代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如果解决问题的方法只有唯一一种，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是在经济学需要应对的各种问题中，这种情形显然并不常见。

回到我们的例子中，政府开支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来考虑以下

014